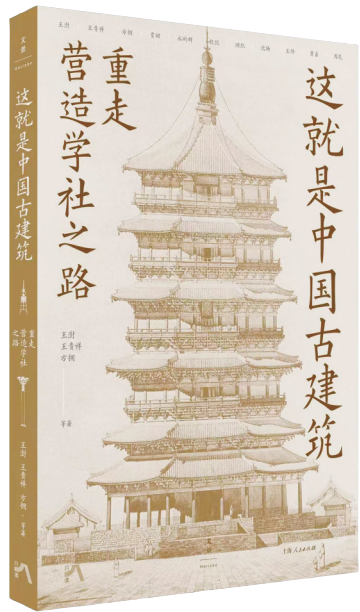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

王贵祥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
王澍、王贵祥、方拥 等著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4月版

我们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谈论梁思成和中国古建筑？

当然，这是一个大话题，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也有一些时机上的巧合。2022年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铃诞辰150周年，也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这让我们再次回忆起前辈学者们对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史和古建筑保护的贡献。

本书共涉及十个部分：第一章从天津蓟县独乐寺开始；第二章谈到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及正定周围的古建筑群；第三章谈到山西古建筑，包括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太原晋祠；第四章是山西应县木塔这个比较有特色和难度的专题；第五章的重点在石窟，特别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第六章是浙江古建和江南园林；第七章是山东曲阜孔庙古建筑群；第八章讲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第九章重点讲解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包括梁思成和刘敦桢发现的汉阙等重要遗址；最后一章是距今时间最近的北京古建筑群。

这样的安排别具匠心，因为它基本上是按照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当时活动的时间、空间轨迹展开的。

1932年梁思成到蓟县独乐寺，这是他研究的第一个古建筑。1933年4月到9月，他先后去了正定、大同、太原、应县、云冈，考察过程中有很多重要发现。

1934年，梁思成受邀参与杭州六和塔的修复工作，借机对浙江的古建筑和江南园林进行了考察。

1935年，梁思成去往曲阜参与孔庙的修缮工作，同时对曲阜古建筑群做了系统考察。

最重要的是，在“七七事变”前夕的1937年7月5日，他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最重要的一座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第八章就是根据这一时间顺序来安排的。

随后，梁思成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由北京先后到了长沙、昆明，后来又到了四川。在生活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梁思成和刘敦桢仍然考察了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这是第九章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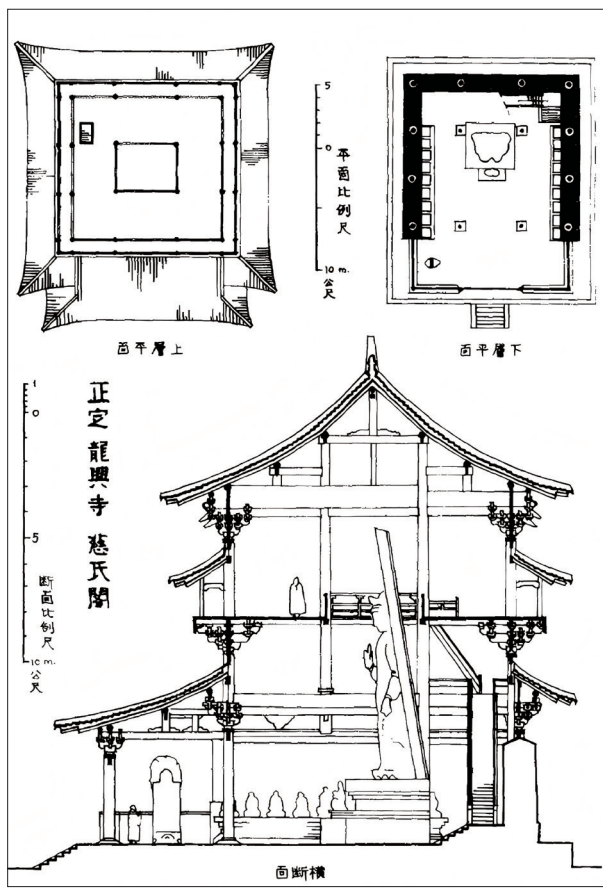
梁思成1934年就已著有《清式营造则例》，对北京古建筑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为北京古建筑研究做了很多指导性工作。所以北京古建筑群是本书的最后一个专题。

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特别是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先生）所开拓的中国古建筑研究道路，对于后辈认识、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梁思成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古建筑之路

在20世纪初，建筑专业的学子很少有人从事古建筑相关工作，因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事情，非常艰苦。梁思成作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他是如何走上中国古建筑研究之路的呢？

首先，从大背景上讲，中国古建筑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真正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如德国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瑞典的喜龙



慈氏阁上、下层平面图，横断面图，梁思成绘，出自《正定古建筑调查记略》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严小稚 王娟

仁(Osvald Siré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日本的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等来中国对古建筑进行了考察。

中国人关注古建筑稍晚了一些，是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开始的。在1919年南北和谈时，朱启铃作为北方的代表到南京谈判，其间他去参观了南京图书馆(时称“江南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宋代《营造法式》的一个抄本(即“丁本”)。

《营造法式》是由12世纪初一位名叫李诫的官员兼学者编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公开印刷的建筑大书。欧洲人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虽然撰写于1世纪，但一直是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其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5世纪。而《营造法式》甫一问世，就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小字镂版”的形式“海行天下”。不过，后来因为战乱，这本书没能真正推广开来。在南宋时期，曾经有过一次重新印刷流行的过程，历代也出现过很多抄本。明清两代，《营造法式》都曾被纳入官方搜集整理的典籍。

朱启铃发现丁本《营造法式》后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抄本印刷、传播。最初是石印版本，但是朱启铃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于是请陶湘找来当时能获得的其他版本对其加以修订。据说，其中还有在故宫发现的一些残页。他们结合几个不同的版本加以核对、校正，在1925年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的出版让朱启铃意识到，中国建筑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关注、研究。最初，朱启铃、陶湘都看不懂《营造法式》，只好请一些工匠来对《营造法式》中的图样进行注释。这些清代工匠加注的名词全是清代的术语，跟《营造法式》中的宋代建筑术语毫无关系，《营造法式》仿佛是一本天书。朱启铃成立营造学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本书。1929年，朱启铃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开端。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跟梁思成发生联系的呢？1924年，梁思成从清华大学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常春藤联盟，并且受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影响，有非常深厚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传统，其建筑系在当时全美领先。梁思成在这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建筑学培养与训练。陶本《营造法式》问世时，梁启超先生认为正在学习建筑的儿子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建筑，所以给梁思成寄去了一套。这是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最初的关联。

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以后，梁思成原准备进一步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但为了搜集资料，他需要先回国。于是，他与林徽因于1928年回国任教，在当时的东北大学创立了建筑系。完整接受了西方建筑学教育的梁思成认为，建筑系的学生也应具备艺术修养，所以任教第一年便计划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雕塑史与建筑史看似无关，但其实是相通的，梁思成在备课期间开始进一步留意中国古建筑。1930年，他完成了《中国雕塑史》课程讲稿，并带领学生对沈阳的清代建筑——北陵进行了测绘。梁思成由建筑教育切入，关注到中国艺术、中国建筑，并希望从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中国建筑史研究。

1931年，受朱启铃的邀请，梁、林二人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紧接着，刘敦桢也加入了营造学社。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成立一年多，朱启铃邀请了一些学者，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去弄清楚《营造法式》，也尝试建立一套与之相关的中国建筑术语，但都没有太多进展。这时的营造学社仍处于比较盲目的摸索状态。此时，梁思成等人的加盟成为中国独立开展古建筑学研究的开端，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之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几千年来中国建筑精品，而且能够认识朱启铃、梁思成、刘敦桢等老一辈中国建筑史学者，了解中国古建筑史发展策略蓝图的历程。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人们对中国建筑的历史毫无概念的时代里，虽然没有便利的交通，缺少测绘的辅助仪器，为了测量屋架数据往往还要钻到积聚了几百年的厚厚尘土中去，前辈学者们仍披荆斩棘地建构起了中国建筑史学。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还能使我们对中国建筑史的“家底”，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古代建筑遗存，有一个大致了解。虽然本书介绍的中国古代建筑十分典型，但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梁、刘等学者从无到有建构出中国建筑史，首先要对当时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古代建筑遗存进行集中考察、研究。很多重要的古建筑实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被发现，比如位于山西芮城的元代建筑精髓、道教宫观永乐宫。阅读营造学社的古建研究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基本厘清中国建筑的历史轮廓。这些古建筑遗存离我们并不遥远，掌握了基础知识，我们便可以亲身去感受这些古建筑，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信心。

建筑设计从业者也可以借由学习中国古建筑史展开思考。毋庸讳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拿得出手的、能够在世界上赢得赞叹的原创性当代建筑作品太少了。有西方人尖刻地评论中国人当下的许多建筑设计是“Mindlessly Repeated”(漫不经心地重复)。即使有一些看起来还算新颖的建筑，基本上也是步外国建筑的后尘，既缺乏原创性，又缺乏中国元素的融入，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放眼世界，例如印度的现代建筑师柯里亚(Charles Correa)设计的建筑，既是现代的又是印度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也是“苏而新”“中而新”，他探索的是一种既中国、苏州又现代的建筑设计。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建筑史的学习，对梁先生创作热情和建筑思想的了解，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建筑设计水平呢？我们能否像梁先生、贝先生他们那样，设计出兼具中国味道和现代理念的、能够让世界眼前一亮的作品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前辈学者在建筑历史研究和建筑设计实践中，虽然关注、提倡的多是建筑艺术层面的东西，但是他们对本质的理解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形式上。曾有人认为，做一些仿古建筑设计就是对中国建筑的传承。但如果没有任何特殊原因，这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我们要设计中国自己的建筑，也要设计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的新建筑，既要传承又要创新。其要点不仅在于外在形式，还在于精神与意义层面的“建筑意”。

“建筑意”这一概念是林徽因提出来的，与古代中国人提倡的画意、诗意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一位建筑师能够体会到中国建筑内在的某种意蕴，并以创造性的形式恰当地表现出来，那么他的作品就能既具备新颖、独特的造型，又带有中国建筑的风韵。这种作品就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好的建筑作品。

(摘自《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总序，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展藏结合 以馆育人

——山西大学文博教学标本馆的实践

李丽萍 高大伦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学标本馆于5月8日正式开馆，紧扣考古、博物馆和文物建筑专业的教学实际需求，采用“仓储+裸展”的陈列思路，集藏品征集、实物展示、实践教学、学生自我管理、文物保护、对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并且持续更新和完善，目标是成为契合学科发展、服务教学需求、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校文博标本馆。

陈列逻辑：以教学为核心，追求极简实用

标本馆面积共计340平方米，分为考古教学标本馆、博物馆教学标本馆、文物建筑教学标本馆和碑刻拓片教学标本馆四个展厅。整体展陈设计主打简约实用，展柜造型、空间布局均围绕藏品收纳、陈列展示与学术研究三大核心需求打造。整体空间以规整的方格柜体排列为主体，柜体设计为层次分明的模块化结构，让全场呈现出井然有序的视觉效果。再辅以专业灯光设计，光影与柜体相融，整个空间通透明亮，专业感突出。展厅内高低展柜交错布置，立式高展柜的开放置物区与带锁闭格合理搭配，视觉上规整大方，又兼顾了藏品分类存放和文物安全。针对体量偏小、易受损的标本，标本馆专门设置抽屉式展柜，内部加装透明隔板分隔出独立存放单元，不仅细化了藏品分类，也便于快速查找、细致观察标本特征。

每个展馆有各自独立清晰的陈列体系。考古教学标本馆按照时代顺序陈列，采用“仓储式+裸展、地层式+类型学”的展陈逻辑，借助仓储管理模式，将完整器物、残件、标本、修复品密集有序排放，回归藏品本体的展示，最大化空间利用率，便于藏品的学术对比研究；结合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同一遗址标本按照出土位置分层摆放，还原原始层位关系，同组器物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历史演变序列，柜体色调由下层至上层逐步加深，直观还原地层叠压的原始状态，展示不同时代的工艺特点和演变规律。展厅中心的地层柜设计得相对低矮，方便学生近距离观察、对比标本。展柜内的每一件标本都标注了器物名称、时代、材质、出土地等信息，实现了考古标本与课本的无缝衔接。牛津大学教授安可在实地参观完后称赞：“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考古教学标本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邢旭也表示：“这才是真正的供教学科研使用的考古标本馆。”

博物馆教学标本馆的标本种类丰富、类型多样，除本土的标本之外，还征集了上千件外国藏品，实现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藏品覆盖面广泛，整体划分为“囊藏·广纳”“良工·巧艺”“古器·新章”“故卷·往事”“辅教·展纲”“远影·留音”“小书·万扣”七个主题模块。采用“抽屉式+密集摆放”的方式，通过自主设计的抽屉式展柜实现藏品密集有序存放，既为标本提供了有效的物理防护，又便于师生按类别检索、近距离观察细节，满足课堂教学与研究的双重需求。碑刻拓片标本馆面积有限，利用拓片可收纳的特点，创新采用“衣柜式+蜂窝格”的收纳方案，通过衣柜式挂放与蜂窝格卷筒存放，彻底告别传统折叠收纳方式，避免了拓片折损的风险。这种模式最大化利用了垂直空间，用不足10平方米的展厅，巧妙妥善保存展示了200余张碑刻拓片，在保障藏品安全的同时，实现了拓片的快速取放，大幅提升了教学使用效率。

教育功能：以实物传学，赋能学科育人

可近距离观察、动手实操是教学标本馆最突出的特色。和常规博物馆只能远距离观赏不同，在确保标本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师生在课堂教学、自主研究期间，近距离观察部分标本，部分质地结实、不易磕碰的器物还能上手触摸查验细节。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原本抽象的专业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易懂。不少学生坦言，从前上课只能通过翻看书本、图片资料辨识器物、胎釉、纹饰等细微特征难以清晰观察；在标本馆建成投入使用后，能够现场进行实物观察、实操对比，对专业内容的理解也深刻扎实了许多。馆内征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学标本馆秉持独到的征集理念

集到的上百套博物馆展陈策划方案和千余份国内外博物馆的宣传手册，能够帮助学生跳出书本理论的局限，提供认识博物馆展陈与宣传工作的全新视角。

标本馆独特的筹建与藏品征集思路，更是学生塑造全新馆藏认知、树立现代征集意识的重要课堂。博物馆教学标本馆秉持独到的征集理念，宣传新世纪世界博物馆收藏的新动向：“现当代的较历史的优先，活着的较逝去的优先，代表性的较精美的优先，日常的较典型的优先”；标本馆内张贴的“我们从来不缺藏品，缺的是发现藏品的眼光；聚沙成塔，积土成山，日征一物，不期速成”等特色标语，彰显了标本馆藏品征集工作的准则和理念。耳濡目染之下，学生跳出传统收藏认知误区，建立起兼顾古今、多元甄别、主动出击的全新征集思维，学会用长远、全面的眼光辨识各类标本的教学与研究价值，使学生在养成征集意识的同时，“提高社交能力，练就专业眼光”。这套新颖的征集理念与文化标语不仅滋养本校学子，也收获来访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实地参观考察后感触颇深，直言这套全新的馆藏征集思路与馆内标语内涵，是本次参观学习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充足且多元的馆藏实物资源，为学生开展学科研究、参与科创竞赛、落实创新创业实践提供了扎实的资源支撑。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立足馆藏实物开展各类实践创新工作，依托标本馆独特的众筹式建馆模式，组队参与2026年“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并获二等奖。此外，依托馆内收藏的古峡迷雾”连环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创作主题影片，让静态馆藏资源以动态影像的形式焕发新生，真正实现文物资源的活化传播与创新性利用。此外，师生还深度挖掘馆藏器物的纹饰、器型等特色文化元素，围绕考古与文博主题开展文创设计、艺术创作等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标本馆常态化开展标本辨识、器物研究、专题讲解、学术沙龙等特色活动，有效延伸了课堂教学维度，丰富了实践教学形式。

学生管理：以实践育人，强化责任担当

与多数高校博物馆由教师或专业工作人员管理不同，标本馆的日常运营、藏品管理、策展陈列、讲解服务等工作，全部由学生团队负责，教师仅承担指导和监督职责，真正实现了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管理模式。

为了做好标本馆的管理工作，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建了一支由不同年级学生组成的管理团队，设立学生馆长1名，下设藏品管理组、策展陈列组、运营协调组、讲解服务组四个部门，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保标本馆的日常运营有序开展。学生馆长负责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标本馆的开放、管理、宣传等任务；藏品管理组负责标本的登记、保护等工作，保障馆藏标本的安全和展示利用；策展陈列组负责展厅的陈列设计、内容更新等工作；运营协调组负责标本馆的开放管理、来访接待、对外联络等工作；讲解服务组负责为参观师生、校外访客提供讲解服务。

对于学生而言，参与标本馆的管理工作，是一次全方位的实践锻炼，是将课

堂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参与标本馆日常运营的学生普遍表示收获显著，不少性格内向的同学在长期讲解服务中吃透标本史料，语言表达与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在标本整理、养护保管的实操过程中，全体参与管理的学生真切体悟文物保护的意义，自身的责任意识与专业担当持续增强。

小微场馆：以小馆联世界，搭建交流桥梁

在我国文博事业发展体系中，国家级、省级大型博物馆凭借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展陈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是社会公众认知历史、了解传统文化的主流阵地。但在宏大的叙事之外，数量众多、类型多元的中小型特色博物馆与高校教学标本馆，同样具备不可替代的学术与文化传播价值。中小型场馆往往聚焦地域文化、细分学科与专项遗存，馆藏更具针对性、研究更具专业性，展示更具精细化，有效填补了大型博物馆在小众领域、高校教研、地方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空白。当前，我国中小型博物馆数量占据文博馆藏总量的绝大多数，品类覆盖自然科学、人文历史、考古文博、非遗技艺等诸多领域，它们扎根于地方，是梳理地方文化、保存地域记忆、展示特色学科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

高校的教学标本馆作为小微专业场馆，如何保持自身定位和特色，如何更好地服务学科建设、发挥育人功能？山西大学文博教学标本馆做了积极的探索，它如同一座联通内外、双向互动的“小木桥”，搭建起地域文化、高校考古学科与外界交流对话的平台。标本馆藏品立足山西深厚的考古资源与地域历史底蕴，依托学校文博专业的教学、科研基础，跳出传统标本馆单一的收藏展示功能，主动向外打开文化交流的窗口。对内，它是师生深耕专业、动手实操的核心阵地；对外，它是参观者了解山西考古遗存、感知三晋历史文脉、学习高校文博学科建设成果的直观窗口。各地的文博从业者、高校师生、学术研究者、文化爱好者慕名来访，在此观摩标本实物、交流学术观点、探讨展陈与育人模式，让不同地域的文博理念、不同维度的学术思想在此交汇融合、互学互鉴。

和大型博物馆面向全社会普及文化的定位不一样，高校教学标本馆的传播作用更加聚焦，偏向专业化学术交流。各地大大小小的中小型文博场馆互相往来、资源互补，跨越地域和学科界限，交织成一套层次丰富、覆盖细分领域的学术交流体系。标本馆空间虽小，承载的文化价值却不容小觑。在文明交流互鉴、学术互通共享的大背景下，高校小微标本馆依靠自身专业、精细、特色鲜明的优势，一头连着本土历史传统，一头对接外界广阔视野。在当下文博育人、地方文化传播的整体布局里，这类馆有着独有的定位，是整套体系里不能缺少、难以替代的一环。

山西大学文博教学标本馆的落成开放，为学院考古文博专业教学掀起了崭新一页。这座由师生一同出力搭建、寄托着大家文博理想的场馆，今后会始终以藏品建设为根基，持续对接国内各大高校、地方博物馆与考古科研单位，深化合作往来，不断丰富馆藏标本、提升教学质量，培育更多优秀的文博人才。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学标本馆展厅设置